

~107

盐亭县文史资料选辑

第九辑

92

盐亭文史资料选辑
卷九
PDG

中国民主政治协商会议
四川省盐亭县委员会编

目 录

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七十周年

- 将军的启蒙良师 廖仲宣 (1)
虎口脱险记 何邦隆 (7)
合格的共产党员何天松 王寿熙 (12)
涪城十月展雄风 江渭川 江 超 (16)
山乡办起了医学院 龚荣中 王德华 (20)

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

- 辛亥革命前后的盐亭 廖仲宣 (25)
辛亥革命前后盐亭的反洋斗争 何天度 (30)
同盟会员谢兆兰 吴志高 (33)
川北义和团回族首领达兴武事略
..... 刘泰焰 达鹏轩 (34)

文史摭拾

- 缅怀蚕丝嫘祖的传说 王德奎 赵良 王映维 (44)
成都医生在盐亭 (三) 杨作清 (53)
古镇人文 衡 平 (57)
建国40年盐亭严重雹灾纪实 冯秀冬 (60)
盐亭今昔话多经 何 烨 (71)
民国时期盐亭匪患概述 孙绪栋 (82)

纪念中国共产党
建党七十周年

将军的启蒙良师

——记袁诗荛与罗瑞卿

廖仲宣

鸿雁高高地飞过长空，发出春的叫喊，融化的薄冰，卷缩的云朵，轻拂的东风，如丝的春草，无不透露出一个勃勃生机的春天的到来。1923年在南充中学的一间阅览室里，常常有一个高个子，瘦削脸的青年，专心致意地翻阅着各种报刊和书籍，不时打开随身携带的本子，边看边摘记。神态是那样专注，那样如饥似渴地刻苦求知。阅览室里尽管人进人出，说说笑笑，似乎对他是毫无知觉的。

一天，他正在聚精会神地看着《新蜀报》，突然从身后走来一位身着黑布中山服，头发蓬松，两颊突出，双目炯炯，仪态安祥的人，随手拿过这青年的笔记本，仔细地翻阅着那上面摘记的文字。不禁兴奋地说道：“你摘记的这些真好哟！特别是这一段我也非常喜欢！”说完竟朗朗有声地念了

出来：“青年循蹈于此，本其理性，加以努力，前进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造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乘风破浪，迢迢乎远矣……”。

青年赶忙举目一看，十分惊喜地站了起来，非常尊敬地叫了一声：“袁诗莞老师！”然后诚恳地说：“袁老师，我自进入学校里来，多次听了你热情洋溢的讲演，使我耳目为之一新，真受到不少的教益，得到极大的鼓舞啦！”

“罗瑞卿同学，别这样说，我的知识也很浅薄，还不是常常来这里看书读报，不断学习，不断地充实提高自己呀！刚才我念的是李大钊的《青春》。这篇文章，我也深有感受。是啊！青春是无比美好的。古谚云：‘百金买骏马，千金买美人，万金买爵禄，何处买青春？’当此国难之际，我们青年人任重而道远啊！青年人就应该有志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说完淡然一笑。停了停，然后关心地问道：“你今天读的什么报纸？”

“《新蜀报》”。

“你喜欢它吗？”

“袁老师，我特别喜欢它。这《新蜀报》的主笔肖楚女写的文章和社论，他说理深刻，分析问题精当，文笔流畅，感情充沛，很能抓住人的思想。我无论课程多么忙，每天一定要挤出时间来细读的”。

“那么，读肖楚女的文章，你明白了些什么道理了呢？”

“有一点，我比以往要清楚了些，那就是要团结全国广大劳苦大众，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国就能转弱为强。这是

我觉得比读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要明确的一点。邹容和陈天华著的书固然使人明瞭了许多道理，可他们却没有看到民众的力量。四川的保路运动若不是广大的民众舍命地投入斗争，也不会获得那么大的胜利！”

“说得好！”袁诗莞称赞道。“罗瑞卿同学，自古以来没有民众就成不了任何事。今天没有民众便没有革命。然而，太平天国、义和团，动员民众范围不可谓不广泛，可为什么先后都被扑灭了呢？这个道理，你想过没有？”

“这，还没有想到过。”罗瑞卿回答。

“我也正在思考着这个问题，我们一起来探讨吧！你的精神是可贵的，在阅览室里我常常看到你，希望今后不断地坚持下去。要把世界的、中国的、四川的和近在眼前南充的情况尽可能多地了解。这样，有助于探讨问题。以后，我们多在一起讨论吧！”说完用力地握了握罗瑞卿的手，然后高兴地离去。

罗瑞卿急忙走出阅览室，睁大双眼，一直目送到袁诗莞的身影消逝后，才又转回阅览室。可这时，他再怎么也安静不下来。刚才和袁老师恳谈，他不象是堂堂南充中学的教务长，也不象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驰名全省英勇善战的四川学生联合会领袖，而倒是象自己家里亲密的兄长一样。他那样随和，那样平易近人，使自己在他的面前一点也不拘束。难怪他在学校的威望是那样的高，他真是我不可多得的良师益友啊！想到这里，一股幸福感顿时在自己的血液里急剧地奔流。

一个盛夏的中午，罗瑞卿来到了袁诗莞的宿舍门前。他缓缓地推开房门，只见袁诗莞短衫短裤，汗淋淋地正在专心

专意伏案读书。罗瑞卿轻声地说：“袁老师，打扰你了！”袁诗堯连忙放下书本，让他坐下。罗瑞卿诚恳地说：“袁老师，近来我常在想，我们中国本是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文明灿烂的国家。可现在，河山破碎，民生凋敝，列强国家，尤其是日本，野心最大。蚕食鲸吞，势非霸占整个中国不可。形势之危，已达极点。我是一个青年，怎能无动于衷呢？我请教过一些老师，有的说科学救国，有的说教育救国，有的说实业救国……，莫衷一是。所以我特地来请教袁老师，究竟怎样才能救中国？”袁诗堯听完他忧国忧民的深情的话语，满腔热情地说：“要了解怎样才能救中国，首先就必须认清中国的现状”。袁诗堯分析了北洋军阀政府丧权辱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四川大大小小的军阀竞相据地称雄，扩兵争霸，兵连祸结，征战频繁。什么武备系、速成系、保定系和军官系的勾心斗角，尔沉我浮，酿就的四川战火连年，搅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安。军阀残酷地收刮百姓，市、乡、区所有粮食，悉被搜尽。粮已征至十五年而外。而半月内一千、三千、二万、三万军饷、匪饷，时时估筹……，辗转催索，昼夜叩门，人民被逼以至服毒或自缢……，而兵匪的兽行，更是令人目眦发指。平民百姓怎能生活下去？那种提倡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在中国都是绝对行不通的。何以救国？唯一的只有马列主义才是挽救中国的良方。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才是救国救民之路。

袁诗堯一席话，罗瑞卿听后兴奋异常。从此更加勤奋地学习，刻苦地研究社会问题，积极参加袁诗堯领导的各种活动。他意味深长地对人说：“袁老师给我讲了很多新知识，使我学到一个新主义，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后来袁诗堯还

创作了一个白话剧——《老爷的鼻烟壶》。并亲自担任导演，组织排演。罗瑞卿在这个剧中，扮演的是那个顽固守旧的乡绅“老爷”。在袁诗莞的指导下，罗瑞卿演得很成功。

1925年春，盐亭县人民向袁诗莞多次发出邀请，希望他能回到盐亭首任教育局长。家乡人民的感情难却，袁诗莞欣然应邀。罗瑞卿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送别了他敬爱的老师。

1927年1月5日，袁诗莞在成都少城公园参加军民集会，并作了即席讲演。这时到成都报考学校，正陷入艰难、绝望的困境之中的罗瑞卿又见到了他久别的老师。师生重逢，分外欣喜！袁诗莞紧紧地握住罗瑞卿的手，亲切地问长问短。听罗瑞卿讲了别后几年的经历和现时的想法后，袁诗莞告诉他：广州的国民革命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帮助下，采取了武装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斗争形式。北伐军从广东出发，所向披靡，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不到半年便推进到长江流域。东征西扫，江南的半壁国土已掌握在革命军手中，国民革命政府正要从广州北迁，黄埔军校和其他一些机关也跟随北上。为了适应发展了的革命形势的需要，军校将在各地招收一批共青团员和倾向革命的青年，重庆也要设立考场。

袁诗莞看罗瑞卿听到这些消息时那兴奋的情绪和炽热的目光，从心眼里高兴。他又说：“国家正需要大批的干部，你到重庆去，报考军校吧！”

没等罗瑞卿回答，袁诗莞又接着说：“重庆的形势比较好，吴玉章、杨暗公、童庸生等在莲花池设立了国民党（左派）省党部。并且在大溪沟办起了中法大学。中法大学里的学生大多是象你这样的进步青年，里边也有南充去的。有个

王义林，你晓得吧？”

“晓得晓得，我们常在一起踢足球。”

“他就在那里。此外，各个县的县党部在重庆也有人。你去了重庆可以找到他们。”

停了停，袁诗莞又非常认真的叮嘱道：“不过，你可要特别小心，右派也在那里，他们是十分嚣张的。西山会议派头子石青阳，在重庆也成立了一个省党部。设在总土地，人称‘总土地党部’，专门和莲花池党部捣蛋，你去了可莫找错人。咋样？还有啥子要我帮忙的？”

“没得。见到了你，我已经就很高兴了。这些日子我正恼火，你指给了路，使我的眼前亮了，我去，就动身吧！”

“好啊！一路保重，祝你成功！”师生二人热情相握，依依惜别，从此，罗瑞卿登上了去黄埔军校的征程。这正是罗瑞卿几十年革命戎马生涯的开端。谁能料到，这次师生俩的重逢，竟成了他们的永诀。1928年，“二·一六”惨案中袁诗莞和其他的13名优秀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革命献出了他们年轻的生命。袁诗莞烈士那种对党的无限忠诚，坚持真理，刚直不屈，对人诚恳直率，热情洋溢的优秀品德，给罗瑞卿以很深的影响。罗瑞卿化悲痛为力量，他经受住了数十年血与火的严峻考验，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的成长，正是与袁诗莞这样一位早期的启蒙良师是分不开的。

虎 口 脱 险 记

何 邦 隆

1935年，红军激战嘉陵江边，一位执行任务的年轻侦察员，昼夜兼程，餐风宿露，当匆匆路过盐亭三岔河时，不幸被当地团正赵舒迟抓获，捆绑在街头的柱子上，扬言下午要拉去砍头。这时，干滚龙赵庆余正和几位哥弟在茶馆里喝茶，天南海北，说古道今，都把自己描绘得智勇超群，无与伦比。其实这伙人行囊羞涩，虽非腰无半文，但也拿不出几个铜板来，而面子是要绷的，大话是要说的，干筋是要扯的。人们对这些干滚龙的评语是：人前绷浪子，屋头喝浆子。

只有一条小街的三岔河，由于抓获了一名所谓的“乌老二”，顿时人声鼎沸，人流拥挤。在那草菅人命的岁月里，国统区遍地腥膻，暗无天日，说砍头就要砍头，绝非危言耸听。

几位干滚龙弄清情况后议论开了。有人挤眼示意，矛头指向“把子”扯得最圆的赵麻子。

“喂，赵麻哥，有本事去把那个‘乌老二’放了，我请你烧五口鸦片烟”。

“如果他有这个胆量，我再加五口，不请是乌龟，不去也是乌龟。”

你一言，我一语，明眼人一见便知，这是用的激将法。

话说赵庆余，平日天不怕地不怕，说话口敞宏大，做事

毛脚毛爪，很爱打点抱不平，是个吃铁吐火的人物。一貫干筋火旺，牛皮吹破天。听了这些刺耳的话，马上心血来潮，桌子一拍说道：“我看今天谁当乌龟，不拿烟来烧，你们是王八。不敢放人，我是团鱼。”只见他站起身来袖子一挽，要来一斤白酒，五个杯子，每人二两，咕咕咕咕，一饮而尽。

他，挺起胸，昂起头，直向街上走去。口中还吐出三个铿锵有力的字：“看——我——的”。

赵庆余走到被捆人身边，轻轻拍了一下对方的肩头：“年轻人，你受苦了。我叫赵庆余，大路不平旁入铲，为什么无据捆人？我来放你，天垮下来我顶住！”被捆人听了这几句话，一股暖流涌进心田，向赵庆余投去感激的目光。

被捆人家住哪里？姓甚名谁？为何路过此地？赵庆余一概不知。带回茶馆后，请在上席坐起，添来一碗香茶，赵庆余还显得很有礼貌哩！

十口鸦片烟自然是不掏分文就烧进口了，那高兴劲儿，实难言喻。不过输家们又替赵庆余担起心来：“你麻哥戳破天不补，放了人咋个收场？”烟盘子上议论纷纷，都在为赵庆余出主意。一致认为，必须找出理由，亲自去见赵团正，否则你麻哥脱不倒爪爪。

依计而行。赵庆余嘻皮笑脸地去对赵团正说：“启禀团正大人，那个青年多么冤枉，我把他放了。你看，他年纪轻轻，容光焕发，周身四体，白白净净的，没得哪一点儿象‘鸟老二’。”

赵团正一听，如雷贯耳，蓦地站起身来猛拍一下桌子：“赵麻子，你胆大包天，把人放了，看我马上就把你抓起来！”

“赵团正，有话慢慢说嘛，何必大动肝火呢！现在是民

国，不是满清，中华民国是国民的国，中国国民党是国民的党，你说对不对？我赵麻子好歹也是个国民嘛，还是本乡本土的熟人，你要抓我，易如反掌，赵团正明知我是干滚龙，腰无半文，把我抓起来，总得拿碗饭吃，不能把我饿死，你说对不对？”

“少说废话，把人给我交来，否则拿你是问！”

“赵团正，我这个干人，说话干脆，做事干净，不会转弯抹角，不会勾心斗角。如果我心头有鬼，我早支他逃跑了，何必还要弄到茶馆里去喝茶呢！再说，我和他从不相识，一无亲，二无故，不能说我是手腕子朝内弯吧！”

一阵语塞，赵团正若有所思，手指头在桌上轻轻地敲着鼓点，怒气还未全消，但看得出来，再不象刚才那样暴跳如雷了。

沉默了一会儿之后，赵团正问道：“你说咋办？”

赵庆余答道：“我看他不是坏人，请团正高抬贵手把他放了，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嘛！”

“说得轻巧，把他放了？”

“团正，好事做得哟！”

“好事做不完。”

“这桩好事积在儿孙身上，后人必定兴旺。”

一提起儿孙，赵团正那时才一根独苗苗，这是接香火的，视如瑰宝。杀了人，最轻最轻的估计，也要遭人咒骂，于是心头软了几分。

又沉默了一会儿，赵团正终于软口软口地问道：“你敢担保吗？”赵庆余斩钉截铁的答道：“汉子做事汉子当，我敢担保！”

又沉默了一会儿，赵团正说：“暂时取保，今后随叫随

到。如若不到，拿你是问！”

赵庆余做了一个滑稽的立正敬礼姿势，响亮地答道：“是！”

当天，日落西山时，被捆人跟随赵庆余到家作客。经过一番商讨，为了能够说明被捆人是光明正大的，不是什么嫌疑犯，眼前不能离开三岔河。因为离开后，赵团正会一口咬定——心虚逃走，赵庆余脱不倒手。

两天后又逢场了，赵庆余不知从哪里找来一件白大绸长衫穿在被捆人身上，被捆人以哥老会兄弟伙的名义认赵庆余为大哥，仍然上街喝茶，行若无事。此后一个多月，每逢场必上街。在此期间，赵庆余还亲自去向赵团正汇报过几次，意在说明被捆人确系良民，否则早就逃跑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赵团正对被捆人的怀疑已烟消云散。被捆人对赵庆余的思想已了如指掌。在一个月白风清之夜，早已酝酿成熟的计划终于实现。被捆人与赵庆余对天盟誓，结为兄弟。这时，被捆人告诉赵庆余，他叫王致用，确系红军侦察员。并把共产党的性质和任务，共产党的基本要求和最终目标，向赵庆余作了宣传。这对赵庆余的思想振动很大。后来，他的种种表现，无不说明这个问题。

简单的结拜仪式结束后，王致用向赵庆余明确表态，现在准备离开此地，前往成都向组织汇报，并裁下一张苏区布币各执一半，作为异日重逢的凭证。赵给王两个银元作路费，并送名片一张，明白告知：凭此片到冷铺子（离城20里），沿途通行无阻。过了冷铺子，我的名片就吃不开了。请你好自为之，善自为之。

一别十余年，王致用下落如何，赵庆余不得而知。解放

后，王在北京，曾以组织名义，数次发函到三岔河查访庆赵余。由于土改时赵被定为劣绅，乡政府未将此事转告。后来王派二人从北京来三岔乡查访赵，此时的赵，由于历次运动都是审查对象，有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当来人在路边巧遇他时，问他是不是赵庆余？一听口音不对，猜测估计不知哪河水又发了，胆颤心惊之余，他连连摆手：“我不是赵庆余，我不是赵庆余！”谎称赵在家里，转身飞快离去。

来人没有会见赵，返回乡政府后，请代为通知。赵慑于威势，不敢不到。确切地说，这要算来人第二次同他见面。随即出示“王致用”三字，问他是否认识此人？赵怕追问王的下落，无法交代清楚，再次谎称“我不认识”。经来人再三诱导解释，赵才说出了过去的详情。

来人告诉他，王在中央工作，要他一道前去北京会晤。赵在北京逗留期间，王曾派专人照料他的生活起居，可谓关怀备至。中央有关部门还给了他一张特种优待证，基本解决了他回家后的生困难。

赵自北京归来后，精神振奋，啧啧连声，逢人便讲他在北京受到的殊遇，自然是绘形绘色，手舞足蹈。

此后一年余，赵病逝于家。

赵在临死之前，流露出心满意足的情态。因他“虎口救人”一事，已经家喻户晓。无论识与不识，均向他伸出友谊之手，投去赞赏的目光。由此可见，为人民作过好事的人，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

合格的共产党员何天松

王寿熙

何天松同志已长眠地下二十年了。盐亭人，尤其是玉龙乡的梓江大队人，时时忆起他的“实干、公正、廉洁、奉献”形象。

何天松，一九一〇年出身于贫农家庭，八岁起就跟父亲给地主做活。解放后贫苦农民推选他当了农民代表、村长。一九五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五五年大队建立党支部，他任支部书记。他常说：“生我是娘，救我是党，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何天松。”组建互相合作，他走东家，窜西家，积极宣传，带领十多户中贫农成立了全县最早的互助组。后又成立了全县最早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人民公社建立后，为了给集体添砖加瓦，他说服社员又把农业社积攒下来的一万多元钱和几千斤粮食送给了人民公社。

梓江大队的一千二百多亩地分布在梓江河畔的瓷窑坝上，是黄泥土系，卵石成窑，生产水平很低，农民生活贫困，是长期缺粮、缺钱、缺烧的穷地方。过去，这里有一首民谣：“有女不嫁瓷窑坝，十有九年灾情大，黄泥石骨堆成山，休想种出好庄稼”。建国后，何天松立下治穷变富的雄心壮

志，誓叫梓江大队换新装。他同贫下中农商量，先在不开秧门的八队搞建设梯田的点，在一队的漏水堰修建提灌站，要把瓷窑坝的旱地变成旱涝保收的良田。

一颗红心似火焰，迎着困难直向前。向大自然进军的战鼓擂响了。何天松在改田工地上处处吃苦在前，哪里活路重，他就战斗在那里，哪里最困难，他就往哪里冲，每天一早，是他第一个到工地，收工时，最后一个离开的又总是他。规划、挖土、筑埂，总是跑在年轻人的前头。

一九六三年，何天松身染肺病，直至双肺穿孔，经常大口大口地吐血。家属和社员们坚决要送他到城里住院治疗。他却说：“大家都在成天斗地，改造自然，我哪能躺着休息呀！病，困难，我都不怕，不改变梓江大队面貌，我死不瞑目！”病稍一松，他又继续投入战斗。贫下中农劝他说：“你身子不好，多休息休息吧。”他说：“共产党员应该为革命担重担。”怎么说也不休息，他觉得这样心里舒坦些。

在他的带动下，社员们斗志昂扬，搬石砌埂，担土壤地，早出晚归，风雪无阻，一直战了好几个冬春，削平了山头，填平了沟渠，小块地连成了大块地。瓷窑坝上四百多亩劣田瘦地变成了平展展的旱涝保收的梯田。与此同时，漏水堰建起了提灌站，兴修山平塘十二口，灌渠纵横，全村实现了水利化；造林三百五十亩，沿河栽芭茅一百四十亩，全村荒山全绿化，社员烧柴自给有余。随着自然条件的改变，农业生产直线上升，粮食亩产由一、二百斤提高到七百多斤，棉花亩产提高十几倍，社员生活显著提高，口粮由三百来斤上升到五、六百斤。面对丰收情景，社员们满心喜悦，千感万谢毛主席，千歌万曲齐颂共产党。

建立大队革委会时，干部和贫下中农怕何天松累垮了身体，决定让他当副主任，这样可以使他得到一点休息的机会，但他还是闲不着，刚栽上秧的五百多亩田遇上了大旱，为了不使秧苗受损失，避免社员用水浪费，他要求承担全大队的管水工作。每天天还未亮，他按捺着疼痛的胸口，手拄细竹棍就上山查看渠道，总得走遍全大队，看看哪块田需水，哪块田该扎水口，渠道有没有问题，等到回去吃早饭时，社员们家已经吃午饭了。晚上人们都睡了，他一人还在山上守水，有时一守就是个通宵。一次，有个囤水塘边的堰洞子漏水了，塘水哗哗往外流，他脱下棉衣，潜下水去，用石头、泥土堵住了漏洞，等他上岸时，浑身冷得直打哆嗦。社员们见了关切地说：“何书记，这样冷，你不该这样。”他却笑着说：“共产党员一事当前，不能先替自己打算，我应该这样作。”

何天松对干部要求严格，他经常给干部说：“我们当党员、干部的，是人民的勤务员，可千万要记住大公无私，两眼不离群众。”在他的带领下，全大队的党员、干部都能以身作则，廉洁奉公，跟班劳动，做群众的好榜样。对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他更是体贴入微。每当严寒，或者遇到大雨山洪暴发，他就睡不着，吃不下，老是想着生产队的哪间饲养房会不会漏雨，哪根田埂有没有问题，哪家贫下中农能不能过冬。他和几个大队干部一起，不管白天黑夜，总是走遍全大队，到贫下中农家问寒问暖。

何天松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事事给群众作表率。生活上省吃俭用，以艰苦朴素为荣。他常常穿粗布衣，到城里开会总是坚持走路。他患病，家庭经济困难，贫下中农一再提出要照顾他，但每次他都婉言谢绝了。一九六九年七月，他病得十分厉害，公社补贴他五十元钱治病，他坚决不要。

何天松以惊人的革命毅力，与天斗、与地斗、与病魔斗，为改变梓江大队的穷困面貌，发展农业生产，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是盐亭农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曾多次出席省、地、县的先代会。他一九五六年出席四川省农业合作社先进生产者会议。一九六二年出席四川省工农业劳动模范大会，在大会上作了“高举三面红旗，战胜自然灾害，夺得农副业连年丰收”的发言。一九七〇年十月，出席绵阳地区第二次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和首届四好单位、五好个人代表大会。在大会上，他作了不怕死亡威胁，革命到老、革命到死的发言，还被地区评为杨水才式的好干部。会议后期，他的病势突然加重，经抢救无效逝世，时年六十岁。

何天松同志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工作兢兢业业，踏踏实实，公而忘私，以身作则，他病逝后，人们缅怀于他。县委号召全县共产党员、干部向何天松同志学习。